

东北经济寒冬: 国企难题

■杨泥娃 报道

东北成了“两会”之后第一个被“审问”的地区。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长春并主持召开了东北经济工作座谈会，研究推进东北发展相关工作。他在会上表示，实现新一轮东北振兴必须靠改革增动力，要积极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支持总部设在东北的中央企业先行试点。将东北地区的国企推向国资改革的实验台，或许将成为再次振兴东北的新契机。

“揪心”的东北国企

到东北视察的李克强总理称，东北的经济数据令他“揪心”。

去年一年，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经济增速分别是 5.8%、6.5%、5.6%，位列全国后五位，远低于 7.4% 的全国平均水平。今年一季度，这三个省的多项经济指标继续走低，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

习惯寒冷天气的东北，却依然无法抵御经济的寒冷。

持续低迷的造船产业使得大船重工不得不“吃老本”，大船重工副总经理殷学林说道：“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我们只接到一笔订单。”

曾经的“钢城”、“油城”也一样饱受着经济困难的寒风。11 年前的龙煤集团，重组了鹤岗、鸡西、双鸭山和七台河“四大煤城”的绝大部分优质煤矿，试图打造成产能上亿吨的煤炭集团并力推上市。而今这家拥有 24 万职工的大型企业却陷入困境，欠员工薪资 8 亿元，亏损约 50 亿元，反转成了被拯救者，靠地方政府“输血”度日。吉林石化更是面临生产艰难，亏损严重，成品油堵库。一直被视为创造共和国自主创新和研发奇迹的大庆油田，从今年起每年减产 150 万吨原油，黑龙江省也将因此减少近 60 亿元的税收。

“作为老重工业基地，东北的经济困难实际上就是国企的困难，重点解决国企问题，就抓住了要害。”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记者说。

东北经济的衰退早就是国家的一块“心病”。继去年 8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后，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时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概括为“四大板块”。国家发改委上个月印发了《东北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专项实施办法》，上周五，李克强总理在长春主持召开东北经济工作座谈会，又继续研究推进东北发展相关工作。

政策的暖风不断吹向“寒冷”的东北，国企改革或将成为振兴东北的“大招”。

着眼点和突破口

东北地区位于中国雄鸡版图的头部，李克强说，“只要东北‘昂’起头，便会带动中西部跟着舞起来，相信这种‘闯关改创’的势头，也会传导给全国！”

东北作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不仅资源优势明显，而且聚集了重型装备制造业、精密仪器制造业、兵器工业等资本密集型国有



企业，其基础优势和巨大潜力，是其他地区所无法相比的。在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实施“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目标，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我国的工业结构正从偏重于轻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重工业、装备制造业、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以信息化带动的新型工业化，而此时的东北国企正是踏上改革列车的好时机。

但东北国企所面临的困难险阻不容忽视，也正是因为这些困难才导致了如今的经济寒潮。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研究员冯立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东北国企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资源型、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等领域，包括煤炭、石油、钢铁、有色金属造船、机械设备制造等，而这些领域恰恰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深度调整的领域，因此东北国企的这些行业和领域则大多沦为重灾区。”

辽宁省长李希在省政府工作报告里指出辽宁经济滑坡，一方面是受宏观经济大环境影响，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减速换挡的特征更加明显，辽宁资源型产业和重化工业比重较高，在当前化解过剩产能的背景下，经济增速必受影响。

然而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企业家和专家在调研后指出：“东北经济的下滑之势，表面看是外部需求不足，投资拉动减弱所致，实质是没有根本解决的体制性、机制性矛盾的集中爆发。”

“东北企业有个特征是受计划经济影响特别深，体质机制的灵活性非常弱，无论在企业的内部体制还是管理体制都刻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包括人员的流动，人员的自由进入和退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冯立果对记者说。

据资料显示，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主持的“甲醇制取低碳烯烃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尽管这项技术早在 2011 年就在其他省份实现商业化运营，但在技术发源地辽宁却迟迟未能开花结果。一位研究人

员说道：“一些国企缺乏创新激励机制，决策慢，常常要几个月才能拍板，然而南方不少企业却主动上门找技术，当场拍板购买，有的甚至成果没出来就先付定金买断。”

东北当下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或许正是企业的体制机制所需要面对的冲击。

“东北企业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思想保守，传统思想比较深入。”冯立果说。即使长期亏损地方政府不得不拖着，大好资源没有形成在市场经济下的活力资源。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他们的市场空间被大大压缩，但他们在面临需求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还不能够压缩生产，这种价格降低但还持续生产的现象其实是背离市场规律的。然而持续生产一方面原因在于企业考核，另一方面是要解决大量职工就业问题必须靠生产。

创新为上

通过梳理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作为“新中国的长子”，作为计划经济的“宠儿”自然享受了不少政策的福利，早已深陷对国家政策和投资的依赖中，同时自身的优越感也使得企业职工和领导长期深陷旧的管理体制与经营模式中，而渐渐脱离市场经济的创新推动。

冯立果认为，李克强的此番东北调研是有的放矢，主要问题在于解决东北地区政府、企业、社会对于新一轮深化改革意识不强，动力不足，闯进不大。“对于东北的企业即使给政策不一定做得好，还需要先行先试慢慢观察，因为有些思想观念的束缚并不是给政策就解决得了的。”

“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依赖，以及对于市场波动的不习惯，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东西需要潜移默化式的改变和修正。无论民营还是国营都是支柱。鼓励大众创业、自主创新等宣传要多做，慢慢化解东北职工社会中的传统意识。”冯立果对记者说。

纵观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之路，国际上依然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例如美国“锈带”复兴、德国鲁尔区矿山演变等基地改造等成功

的例子不胜枚举，尽管其政策环境、产业类型和基础虽有不同，但改造思路却都有着共同点：在改善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对现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升级改造。

尽管东北企业的一片低迷，但也不乏有着一些创新企业在蠢蠢欲动，沈阳华晨宝马企业通过设立研发中心，研制最新型的发动机，不断地研发创新使得企业在 2014 年的产量增长 34%，产值突破 1000 亿元。尽管沈阳机床厂一片萧瑟，但在大连金普新区的一个地下机床厂却利用科技调控生产温度、湿度、把握每个生产环节的精细化，打入了德国市场，并打算继续扩大生产场地和面积。

李锦对记者说：“东北的国企改革首先是自身转型升级，关掉产能过剩的企业，将新兴产业和有发展起来前途的企业推动加快发展的步伐。”

冯立果认为，东北国企的改革关键点在于怎样解决资产固化和流动性偏弱的问题，“需要从这个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说的深化国资改革，通过整体上，区域性的兼并收购，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可能使东北资源得到盘活。同时可以考虑如何利用现阶段牛市的股市格局，去盘活一些国有资产。”

企业自身不断发展创新驱动的同时，政府也要为企业发展后劲做好保障和兜底，“原有国企职工的就业和安置需要通过发展新兴产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完善职工再就业培训，政府在这个方面要起到兜底的作用。”冯立果说。

“尽管很多政策不断出台，但一些政策可能会面临开花了却依然不能结果。政府需要加快完善政策的配套机制，同时继续加大扶持力度。”李锦说。

冯立果也指出，如今大的经济形势没有得到复苏，对于东北企业整体发展空间来说，从大形势上来说还不是别比明朗，“最坏的时候”还没有过去。但基于东北地区的优势资源和产业优势，对于一些新兴产业来讲东北地区还有很大的发展机遇。

(据中国企业报)

三线城市房地产仍过剩：资源城市窘境陷价低滞销

■汪晓东 报道

相对于房企不遗余力的宣传，市民似乎更愿意看到实在的利好。3 月 30 日，楼市新政出台，上海甚至出现人群连夜排队购房的现象。有媒体报道，上海融绿单日成交达到了 4 亿元，这个数据，问鼎上海房企单日成交额。

与一线城市瞬间积聚的火爆人气一同，三、四线资源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却仍然徘徊在过度开发，供给过剩，总体风险持续加大的尴尬中。

有楼盘五成房屋空置

“尽管一些人认为近些年资源城市房地产搞得是多了一些，但其实并不像外界说的那么严重。然而，因资源而兴的城市，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困境，目前他们面临的依然是，如何拉动商品房销售以减轻企业资金周转压力，防止资金链断裂避免楼市崩盘。”社会学家简易说。

山西宏图建设有限公司郭志强告诉记者，大同房地产业的扩张吸引了众多资金的涌入，以及大量外地务工人员。

在 3 月 30 日，春雨斜织，大同小西门的一栋高层商品楼的住户，正吃力的将煤气罐搬上 19 层，女主人讪笑：只有达到四成以上的住户，煤气才能通入家中。

她告诉记者，拆迁后，每平方米多出 800 元才买到如今的商品楼，但入住率不到四成让这里住户生活极为不便。

晚上 7 时，站在女主人家中，记者看到，对面的高层星星点点亮着的灯光，粗略计算，不足三成。

根据山西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0 年大同市房地产业开发投资 90.6 亿元；2011 年飙升至 134.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1%。

然而，2014 年上半年，太原和大同两市开发投资分别完成 139.3 亿元和 71.3 亿元，同比增长分别 7.2% 和 5.9%，增幅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 6.6 和 82.2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开发投资增速由上年同期 14.8 个百分点下降到 3.2 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商品房销售面积虽低位回升，但资金充裕度下降，房屋新开工面积负增长、土地储备减少，全省房地产开发市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明显放缓。

郭志强告诉记者，项目规模大幅回落，开发企业筹措资金难度加大、库存增加，煤炭市场持续下挫是制约资源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简易认为，上述原因造成外来务工人员急剧减少，人口增长明显低于房屋库存的增加，人群购买力下降，因此，一半以上新楼盘入住率达不到四成也就并不为奇。

价格打至县级

有数据统计，中国房地产业目前待售商品房面积约 6.3 亿平方米，而在这个数据中三线城市又占 70%。

简易告诉记者，3·30 新政策下，城建税、教育税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费用被减免，而这个减免显然是为了稳定楼市，同时增加住房刚需和房屋的交易量。

然而时下，经历急速扩张之后的资源城市似乎并未领情，反而，大量空置的楼盘让昔日热闹的城市变得如同“鬼城”。

据山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3 月，大同市城镇人口 337.48 万人，朔州市 174.41 万人。鄂尔多斯市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14 年，全市城镇人口 148.16 万人，城镇化率达到 72.8%，比 2013 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高出全区平均水平 13.3 个百分点。

虽然资源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增长，但在这些城市，到处林立的楼群无人问津并不稀奇。

有市场分析师认为，一边是住房刚需减弱，一边是资源城市急速扩张造成房屋库存增加，供大于需。今后，鬼城林立的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

郭志强认为，由于存量房、拆迁安置房的大量入市，导致大同房地产价格始终在低位徘徊。

有信息显示，早在 2004 年，大同第一个商品房就定在 3360 元的高位，时至今日，其销售均价也不过 3800 元而已；2011 年大同当时的房地产销售均价是 4300 元，如今，房地产销售均价整体仍在 4200 元左右徘徊。

简易告诉记者，三线资源性城市拉动住房刚需能力有限，其每年城市增长人口基本为 3—5 万人，前些年急剧扩张之后，城市空间的拉伸与人口增长形成较大反差。未来 5 年之内，供大于需的局面仍将存在，矛盾中的住房刚需势必造成鬼城现象的发生。

而上述市场分析师亦指出，3.30 新政之后，特大型城市出现排队购房并不能代表楼市从此无虞，房贷新政只能短期缓解楼市压力，扭转楼市进入下行通道的中长期趋势中仍然会稍感乏力。

京津冀蓝皮书：建三地人口信息平台

■王妍 李文姬 报道

4 月 16 日上午，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15）——协同创新研究》发布会在京举行。

蓝皮书指出，目前，人口、城市功能过度集聚、行政分割、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是影响和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因。建议尽快构建京津冀跨省市公共服务分担与统筹体系；建立京津冀人口流动信息交流监测平台，实时交流三地人口流动信息，对现有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整合与对接。

同时，京津冀大数据研究中心也于 4 月 16 日正式成立，将致力于运用大数据思维，对京津冀区域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分析。

配置不均衡 应建跨省市统筹体系

蓝皮书称，京津冀集聚了全国最优质的教育、文化、医疗、科技等资源，近年来区域整体公共服务水平逐渐提升，但三地公共服务的落差较大，影响了要素流动、功能疏解和协同发展。

三地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是由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差距过大造成的。公共资源配置与现有的“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直接相关，与地方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有关。

建议：蓝皮书建议，公共服务领域的协同创新，应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

现行的财政体制，完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根据区域功能、区域人口和面积等客观标准，建立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构建京津冀跨省市公共服务分担与统筹体系。

需通过“联”促进“流”

报告指出，京津冀区域交通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市群内城际间交通运输结构单一，铁路运输能力不足。超大城市市内轨道交通密度不够，市郊铁路发展不足；交通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城市间缺乏直接运输和微循环，区域机场群、港口群之间缺乏分工协作，多种运输方式间更是衔接整合不够等。

建议：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对现有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整合与对接，通过“联”促进“流”。例如加强超大城市市内轨道交通与市郊铁路建设，实现区域内大中小城市互联互通。促进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交通枢纽相互对接，提高交通通达性和服务水平。同时，构建“一小时”交通圈、半小时通勤圈，实现区域公交一卡通、客运服务一票式、货运服务一单制。加强区域内国际机场建设，打造一个区内整体的“分布式大机场”。

搭三地信息交流监测平台

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的人口问题一直受到关注。特别是作为区域内特大城市的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近年来的外来人口急剧膨胀。

蓝皮书指出，京津两地外来人口持续增

长既有市场原因也有政府原因，此外，超大城市落户由多部门审批，准入条件与规模调控之间缺少有机联系，也是造成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困难的原因之一。

建议：针对京津冀超大城市的人口调控，应建立京津冀人口流动信息交流监测平台，实时交流三地人口流动信息，并对人口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监测。

此外，人口管理调控涉及面广，需要有一个综合协调部门承担这一工作，该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订每年三地人口指标分配方案等。同时，短期内，对于京津两个超大城市，应继续发挥户籍在人口调控中的作用，通过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渐降低京津两地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供需矛盾加剧

蓝皮书指出，京津冀区域尤其北京市、天津市水资源重度短缺，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地下水严重超采。京津冀各大流域水生动物数量明显减少，且城市地表水和地下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同时，由于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线建设相对滞后，水体纳污能力接近极限。

就北京而言，从供给角度看，北京市多年（2001—2013 年）平均水资源量为 24.8 亿立方米，但用水总量在 35.4 亿立方米左右，用水缺口约 10.6 亿立方米。

由于北京市地铁、地下管线及其他地下空间（如人防工程）等设施建设，中心城区地下水“库容”减少，地下水超采与地面水空间的缩减，加剧了水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与水环

境的脆弱性。

北京地下水水位每年以 1.1 米的速度持续下降，从 1999 年到 2013 年已经降了 20 多米。

建议：成立京津冀区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协作委员会；建立专项基金，探索建立“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财政支持体系；划定红线，保障生态安全；共建区域“碳交易”市场；积极发展生态教育旅游与生态文化创意产业，提高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赋存丰富 可多元化利用

蓝皮书指出，预计 2015—2050 年，京津冀地区年能源消费总量仍将持续增长，依靠以煤为主的传统能源难以为继，必须走多元化的能源发展道路，需要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

京津冀地区新能源赋存丰富，应在京津冀地区全面推行太阳能入户、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核堆供热工程。

建议：尽快建立生态环境共建共享机制，包括：统一规划建设区域生态体系，划定资源上限、环境底线和生态红线；共建国家级生态合作示范区；尽快建立碳排放权、排污权的区域交易市场等。

此外，还应明确城市增长边界，构建环京津冀城市群森林圈。设置绿色隔离带，保持合理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比例。对大气、水污染进行分区控制，建立区域风沙防御体系。在北京六环和城市外环建设环京森林带，建设一批环京国家公园。